

情谊与事业

——在周恩来心中





1960年11月周恩来和朱德在北京机场（今首都机场）

1963年周恩来到
机场迎接宋庆龄



1963年周恩来
与贺龙在劳动
人民文化宫参
加五一国际劳
动节游园活动





1956年11月周恩来和胡志明亲切交谈



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新四军时与叶挺
(站立者左一)在青弋江竹筏上



1952年周恩来与
李四光亲切交谈



1962年周恩来在
香山和电影艺术
家们在一起

60701/22
20
18
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有机会看到许多有关周恩来的历史文献，有幸走访了许多与周恩来交往或接触过的前辈，使我们对这位时代伟人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们不仅了解了周恩来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尽的艰辛，为创建新中国建立的丰功伟绩，为人类进步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一系列卓越思想和多方面的优秀品质，而且还看到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几十年间展现出的丰富而美好的感情天地，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独具魅力的地方。

70多年前，他在东渡日本前夕曾给一位同学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他抒发的不仅是豪情壮志，也表明了对情谊与事业的基本态度。

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恪守了情谊与事业密不可分的信条。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富强，他奉献出真挚的情谊，换来了党内同志间思想统一、团结奋斗；促进了社会各界朋友的相互理解、共同合作；赢得了国际友人的真诚同情、友好支持。

他待人坦荡无私、率直诚恳，谦虚平易、豁达大度，热情周到、关怀备至。特别是他那包容五湖四海的宽阔胸怀，使人们不能不对他产生敬佩、信赖和亲近的感情。他在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中，在国际友人和家人亲属中，留下了许多充满深情厚谊的动人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崇高思想境界，它深深地吸引和感动着我们。于是，一个小小的心愿油然而生——

把这些故事编辑成一本书，奉献给热爱周恩来的人们。愿熟悉他的老一辈能从美好的回忆中悟出新的体味；在岗位上奋力拼搏的新一代能继承发扬他的美德；尚处成长中的年轻朋友能受到教育与启迪，以周恩来为楷模，塑造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编这本书的初衷。

目 录

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	方钜成 姜桂依 (1)
——记周恩来与毛泽东	
尊重 信赖·····	吴传煌 (17)
——记周恩来与宋庆龄	
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	姚建平 (25)
——记周恩来与朱德	
模范夫妻·····	方 铭 成也竟 郑淑芸 (31)
——记周恩来与邓颖超	
追忆·····	沈葆英 (47)
——记周恩来与恽代英	
情深似海·····	薛 明 (54)
——记周恩来与贺龙	
人生得一知己 可以死而无憾·····	廖心文 (69)
——记周恩来与叶挺	
丹心一片对友人·····	刘春秀 (81)
——记周恩来与徐海东	
关怀·····	降边嘉措 (87)
——记周恩来与班禅	
同志加兄弟·····	何延虹 (98)
——记周恩来与胡志明	
地久天长 情谊永存·····	张魁堂 李海文 (106)

——记周恩来与张学良	
友谊之花 经久不衰·····	余湛邦 (120)
——记周恩来与张治中	
安危与共 风雨同舟·····	仲向平 (130)
——记周恩来与张冲	
协力 同心 共命·····	李畅培 (134)
——记周恩来与郭沫若	
风风雨雨 30 年 ·····	尚 丁 (147)
——记周恩来与黄炎培	
人生乐在相知心·····	李 静 (159)
——记周恩来与李四光	
南侨报国觅知音·····	庄明理 (167)
——记周恩来与陈嘉庚	
春雨润物细无声·····	朱海北 (174)
——记周恩来与朱启铃	
弥为珍贵的一页·····	贾英华 (182)
——记周恩来与溥仪	
湖畔的哀思·····	廖心文 (206)
——记周恩来与老舍	
挚爱的良师益友·····	梁秉堃 (211)
——记周恩来与曹禺	
艺术大师的知音·····	李 静 (222)
——记周恩来与徐悲鸿	
铁窗梦断感殊恩·····	袁 鹰 (229)
——记周恩来与于伶	
以诚相待·····	沈祖安 (249)
——记周恩来与盖叫天	

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

——记周恩来与毛泽东

方钜成 姜桂依

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的碑文是：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纪念碑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破土动工的。周恩来总理站在麦克风前向在场的各界领导人讲话时，毛泽东就站在前面，宋庆龄和朱德站在他的两侧。这个庄严的仪式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并肩工作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碑的碑文是由毛泽东草拟、周恩来手书的。可以说，这个纪念碑是他们合作共事的一个象征。

早在 20 年代中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发动推翻北洋军阀统

治的北伐战争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便有了来往。但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却是1934年秋红军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后几个月才开始建立的。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906—1976)主张取消秦邦宪(又名博古)(1907—1946)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奥托·布鲁恩(又名李德)(1900—1974)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军事上的失利负有部分责任(不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甘愿做他的助手。从1935年开始,由于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拥护,加上无数久经考验的同志全心全意的努力,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祖父是旧官吏,父亲长年在外省谋事,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大多数湖南人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

例外。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他才进入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又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毛泽东酷爱读书，但受正规教育的时间较短，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书报和杂志获得的——先是在长沙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后来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一点与在国外有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周恩来大不相同。

毛泽东受的学校教育虽然有限，但是他最终成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在同蒋介石作战时期，他只能依靠助手们从遥远的城镇邮局弄到的报纸和杂志来了解情况。从长征时期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这正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他是人民愿意追随的领袖，能用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说明深奥的道理。

周恩来从留学时期起就懂英语和法语，也会一些日语和德语。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学过一点英语，当了国家领导人之后又重新对英语发生兴趣。在一位教师的辅导下，他坚持学习英语，直到晚年，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间断。他希望能直接阅读一些用英文写的外国哲学原著。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有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而且都能写一手好文章。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偶尔还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写文章，而周恩来主要是抓重要文章的审定工作。《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特别是有关对外政策的社论时，常常是周恩来审批校样，检查标题甚至版面。为了让周恩来赶在凌晨一两点钟报纸开印之前审阅大样，有时不得不打断他同外国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周恩来会见记者一般都安排在晚间，因为他善于在夜里工作（毛泽东也是这样）。这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当时党的领导人白

天忙于指挥作战，夜间阅读和处理文件。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里，周恩来因患病不得不放松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于是江青一伙就利用新闻工具为他们的夺权阴谋服务。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那样在性情上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往往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例如1958年8月发动“大跃进”，而稳健的周恩来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

他们两个人都相信群众并实行群众路线，不赞成“一言堂”，反对一个人说了算。在解放前他们都卓有成效地提倡群众路线，并且身体力行。但是，后来毛泽东随着他的威望的提高，渐渐忽视了群众路线。他相信自己的主张多于相信集体的意见，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尽管他口头上也反对搞个人崇拜。他晚年一再陷入“一言堂”，而且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所表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言堂”的产物。即使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产生“一言堂”的土壤，因为它与家长制密切相联。家长制这种统治方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存在了几千年。此外，由于毛泽东确有功绩，人民真心崇拜他，把他当做英雄，而人民的崇拜使他陶醉，结果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在晚年喜欢与同一代人中一些保守色彩较浓的人物交往，在他的私交中，他很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主席，同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交往。他乐于同文艺界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也喜欢聆听各方面有专长的学术界人士的说言高论。很难想象，毛泽东会像周恩来那样特意同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交朋友。

毛泽东有他的偏爱，也不隐讳他喜欢做什么或不喜欢做什么。在70年代去世的政治局委员中，他只参加了1972年1月10日为陈毅元帅举行的追悼会。他常常同陈毅就写五律、七律诗交换意见和通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恩来不断设法保护陈老总，但是这位老师还是蒙受了许多屈辱。也许是出于内疚，毛泽东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亲自去悼念陈毅。

毛泽东有一次浮想联翩，对自己作了直率的剖析。他说自己兼有“虎气”和“猴气”两种性格，“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7月8日他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信中谈到的。林彪死后，这封信曾向党员和机关干部传达。毛泽东在那封信中还谈到林彪一味研究中国和国外的政变和热衷于把毛泽东吹捧上天。

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合“虎气”和“猴气”于一身，这是个有趣的论断。据中国民间传说，老虎天性勇猛、无所畏惧、敢冲敢闯，而猴子天性顽皮、聪明伶俐、机敏灵活。在中国，老虎和猴子都是人们喜爱的动物。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几次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较量，双方力量悬殊，共产党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似乎必败无疑。然而正是毛泽东身上兼而有之的那种无所畏惧的虎气和机敏灵活的猴气使他和同志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坚持下去，取得胜利。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在全国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这时，共产党按照大多数领导人的主张，继续举行成功希望极微的城市起义。是毛泽东大胆地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进行斗争。

在1934至1935年的长征期间，也是毛泽东制订的勇敢而机智的战略挽救了红军，把长征初期的败退转变为震惊世界的英雄史诗。

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装备和兵力上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相比，都占绝对优势，但是毛泽东还是决定与蒋军决战，这又是个勇敢坚决而深思熟虑的举动。

全国解放后，最重要的例子当然是1950年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有些人认为，在刚刚结束了20多年的战争不久，就同一个超级大国较量岂不是发疯了。但是，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于是政治局和政府中的同事们终于同意了这项果断的决定。

朝鲜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宣告结束。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看到国民经济在短短几年里得到恢复，真是喜笑颜开。但是，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成绩面前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事前没有对国家面临的形势作深入调查和认真分析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界线。这些错误的造成，毛泽东有责任，但是，也不能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大跃进”的错误，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也是负有责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用林彪和江青打头阵，而他们又反过来利用毛的威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毛泽东几乎当作一尊神来供奉，以便从中渔利。由于毛泽东晚年患了重病，后期病情恶化时，他说的话不易听懂，而且耳朵不灵，工作人员和翻译只好看他的嘴唇的动作，猜测他想说什么。这一切使他对周围和全国发生的事情更加耳目闭塞。于是，江青一伙就乘机利用，无所顾忌。

林彪最初采用的手法是肆意利用他发明创造的所谓“红宝

书”显示他比别人都革命,对毛泽东最忠诚。“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说:“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在林彪被正式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赞成林彪片面强调政治而忽视业务的狂热主张。周恩来认为,政治只有落实到业务工作上才能表现出它的作用。林彪通过他控制的舆论工具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林彪和江青先后都疯狂指责周恩来偏离党的路线,而周恩来毫不动摇,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国务院各个部门,周恩来实行政治必须落实到业务上的原则。在那黑白颠倒、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为所欲为的日子里,他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使被打乱的政府机构得以照常运转。

建国以后,周恩来曾两次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次是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他不得不设法收拾错误政策带来的一团糟的局面。1959至1961这三年,由于实行极左政策,粮食歉收,加上苏联停止援助和撤走专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幸而在熟谙业务的几位副总理协助下,周恩来扭转局面,使国家度过了难关。1962年以后,形势开始好转,要不是随后又执行了极左政策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国本来会沿着恢复和发展的道路进入70年代的。

乍看起来,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工作不像前期那么顺手。因为林彪摔死后,大权在握的江青一伙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然而,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还是把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高级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保存下来了。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周恩来在晚年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包括中美建交这样微妙的外交行动),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保存下来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周恩来的这一功绩将流芳百世。他的政治家的韬略

和他在极其复杂、近乎无望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将长留人们的记忆中。

“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情况与后五年大不相同。那时周恩来不得不跟毛泽东走，因为只有保住总理职位他才能使庞大的政府不致四分五裂。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他不得不应付一大批人，那些人既不能轻易说是敌人，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同志。1971年，林彪完蛋了，“红卫兵”也收敛一些了，斗争情况有了变化。他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很利落、有章法，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林彪事件震动了毛泽东，他没有料到自己亲手挑选的接班人会反对他，甚至发展到要谋害他的地步。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把周恩来当作他必须倚重的同志和同事。

在“文化大革命”前半段，周恩来在党的领导层中是第三号人物，居林彪之后。而在后半段，他的地位仅仅在毛泽东之下，这就大不一样了。林彪于1971年坠机身亡之前，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而周恩来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向毛泽东请示，就不能绕过林彪，也不能不让他知道。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事情也变得简单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

1975年冬，毛泽东的病情日益恶化。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担任他的联络员。江青设法使毛泽东办公室往来的文件、指示，统统经过这个听命于她的年轻人之手。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用毛泽东名义批发下来的指示和命令是否经过篡改或是否是伪造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周恩来从未遇到过这样严重而复杂的问题。为了保护正直和富有经验的干部不被毁掉，他必须同党内一个强大的宗派势力进行斗争。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倒了，许许多多好同志就会同他一起倒下去。敌人